



短史记

曹操是「摸金校尉」祖师爷，墓葬为何还被盗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郭春雨

近日，曹操墓文物即将集体亮相的消息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曹操墓(安阳高陵)本体保护与展示工程，已进入文物布展阶段。经各方十余年努力，曹操高陵出土文物已修复970余件，文物展示项目计划明年初进入布展阶段，届时包括标志魏武王身份地位在内的随葬品将集中亮相。

曹操，这位活在历史课本上的传奇人物，他的大墓是如何发现的？在沉寂的近1800年中，曹操墓经历了什么？其中的出土文物又体现了曹操怎样的真实人生？

近年来，随着盗墓小说的风行，“摸金校尉”一词也广为人知，为曹操墓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据史书记载，摸金校尉起源于东汉末年三国时期，汉代陈琳所作《为袁绍檄豫州》云：“操又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曹操为了弥补军饷的不足，设立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等军衔，专司盗墓取财，贴补军饷。

作为“摸金校尉”的“祖师爷”，曹操墓的真伪判定颇有争议。关于曹操墓所在地，1000多年来说法众多，诸如许昌城外说、漳河水底说、铜雀台下说、河北彭城说，最著名的莫过于七十二疑冢之说——曹操临死前害怕坟墓遭到盗掘，吩咐死后将72座棺木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抬出邺城，埋葬在漳河旁72个不同的方位，布下迷局。

安阳高陵的发现，也充满了传奇色彩。2006年春节过后，河南安阳安丰乡西高穴村的村民徐焕朝在浇地的时候发现田地深处有个直径在一米左右的大洞，洞口还有翻动过的新土。村里人把洞填上后，过两三天后发现又被人打开了。

安阳古墓多，不少村民也都见识过盗洞的样子，当地出现传闻，说这是非同一般的大墓。考古专家潘伟斌当时正在当地考古，听说此事后就打听着到了这个大墓。因为是临时探究，挖掘条件简陋，就找当地人在盗洞上方拉了根绳子，潘伟斌拽着绳子下了盗洞。

大墓早就被打开，也就不用担心气流不通等问题。下到五六米深度的时候，潘伟斌感觉脚下有东西，以为快到墓底了，正好绳子也快到头了，一松手，结果脚下不是墓室底部，而是一个疏松的土堆。潘伟斌脚下一滑就滚到下面去了，手里拿着的手电筒也摔得没影了。

潘伟斌摸索着找到了手电，打开灯光的瞬间惊呆了——这是很高的一个大墓，墓砖非常大，墓的结构比较复杂。同时，眼前出现了一个门洞。由于墓内满是淤土，潘伟斌只能尽量压低身体移动，钻出门洞后豁然开朗，眼前是一个大厅。根据规格，潘伟斌很快判断，这里大概率是东汉时期王侯一级的墓葬。怀着激动的心情，潘伟斌将自己的发现进行了报告。

2008年，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准了对西高穴东汉大墓进行抢救性发掘的申请。但最初发掘结果却让所有人大失所望。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完墓道后发现，这座大墓的墓门已经被盗墓者打开了。原本由三层汉砖垒砌而成的封门砖，现场仅剩下不到1米高的一段残垣。

而墓室内部更是损毁严重。不只有盗墓贼留下的扰土，考古工作者还发现，其中的很多陶器、石板已被砸烂，甚至还找到了盗墓贼留下的矿泉水瓶子。

但历史总会留下蛛丝马迹。2009年11月，考古队员信英超、尚金山发掘出一个断裂的小石牌。清理后发现，石牌上写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几个字。专家认为，这里的魏武王正是曹操。

2009年12月，中国国家文物局认定安阳市安丰乡西高穴村南的高陵即为曹操墓。

中国帝王厚葬源远流长，秦始皇陵出土的兵马俑震惊世界，汉武帝以天下贡赋的三分之一为之修陵，唐太宗昭陵“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就是最后一个帝陵光绪崇陵，陵墓也颇壮观。汉代一个诸侯王刘胜死后都穿着2498块玉片，1100克金丝构成的金缕玉衣。但考古队在淤土底层发掘的物品，大多是铠甲、兵器、玉佩、砚台、书案、棋子一类的生活常用之物，甚至可以说算不得贵重精美。不过这也正好对应了《三国志》的记述，曹操死前曾有遗令，其中明确写道，“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

而在曹植描述父亲曹操下葬的《诔文》中也记载，曹操严格实行薄葬，下葬的物品简陋，而且多为陶器。这一点，曹操墓出土文物与历史记载相吻合。

不过，据媒体报道，虽然曹操墓的文物遭大量破坏，但因为曹操是以诸侯王身份下葬，享受的是“天子礼仪”，文物中不乏金舆车银舆车、十二旒冕冠。在礼制上，高陵出土的十二个陶鼎是皇帝去世的标配，从这些文物都可以看出，这些都是曹操独一无二的象征。

实际上，即便遭到盗墓贼的多次抢掠式毁坏，据史料记载，陵墓面貌的最早一次大变动，却是在曹操儿子魏文帝曹丕的时候。

黄初三年，魏文帝曹丕下诏，以“古不墓祭，皆设于庙”的古礼为理由，毁去“高陵上殿屋”。据研究专家分析，曹丕真实的、更深层的考虑在于“要消除陵上的标志性建筑，隐藏墓葬，让后代的盗墓者、毁墓者找不到曹操的陵寝所在地”，这或许正是因为曹操父子在汉末三国的动荡中，曾耳闻目睹此前陵墓遭盗掘的惨状。

“毁陵”后，曹操墓又在西晋时被彻底毁坏。考古发掘显示，在曹操墓出土的石碑中，写有魏武王的都被砸碎，而没有写魏武王的却完好无损。此外，墓中男性遗骨的鼻子、脸部也被砸毁。经过专家推断，曹操高陵最早被盗的时间应该是在西晋八王之乱中成都王司马颖镇邺期间，盗墓者一般仅为求财，不会大规模破坏。专家据此推测，曹操墓很可能因政治报复而被毁。

即便是安阳高陵的曹操墓，在认定方面也一直存有争议。安阳高陵在发掘与认定过程中，对于是否确属曹操一直有不同声音。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徐苹芳生前就曾质疑，在“中国社科院公共考古论坛”上，时任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坚持表示，由于确认曹操墓的西门豹祠和鲁潜墓志等仍然存疑，对曹操墓虽然可以“根据考古研究的方法，初步断定”，但这“不是最终的结论，还不能盖棺论定”，后来接受采访时也多次如此表态。

据曹操高陵考古队领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曹操高陵文物展览项目负责人潘伟斌介绍，曹操墓目前还有部分尚未修复完成，如果修复完成能够达到一千多件，所出土的文物有很多都能反映出曹操的独特身份。此次曹操墓的文物展出，也将进一步揭开这萦绕了千年的迷局。



安阳高陵出土的刻铭“魏武王”石牌、画像石。

【人物志】

何伟和他的非虚构写作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范佳

最近，非虚构作家、美国人何伟在“学人Scholar”公众号上发表了一篇长文《在四川：疫情期间，我如何学习中国》，文中不仅再次描绘了他眼中的中国，还娓娓叙述了他和中国二十多年的缘分。

历史悠久的国家对何伟极具吸引力。离开中国，在埃及待了五年后，他又回到了中国。去年，何伟和家人搬到了成都，如今他任教于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用英语教授非虚构写作和大一作文课。去年9月4日，他在四川大学开讲，全场爆满，甚至有人专程从外地飞来听讲。

何伟选择定居成都的部分原因，要追溯到二十多年前，1996至1998年他曾在川渝大地任大学教员。那时候，他的学生大多来自农村。之后，他再也没教过书，这次他回到成都，是希望和中国教育系统重新联线。这一年，可以算是他回归与转折的一年，他刚好50岁。

何伟原名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曾任《纽约客》驻北京记者，以及《国家地理》杂志等媒体撰稿人。《华尔街日报》称何伟为“关注现代中国的最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

爱读书的人知道何伟，源自他的中国纪实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和《寻路中国》。这三本书横跨了中国十余年，处于世纪之交的十年中国经济实现了腾飞，是中国历史上最关键的时期之一。

何伟对中国的兴趣，源于他1994年首次中国之行。当年他和一个牛津大学的同学赴十多个国家旅行，从捷克到泰国，从俄罗斯到蒙古，从中国到越南……来之前，他对中国没什么印象，但到北京后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他们一路向南：上海、合肥、云南、广州……6周旅行，让他们看到了一个欣欣向荣的中国。何伟感到，这是一个有变化、有希望、有能量的国家。旅游之后，他决定要回到中国，他认为这段时间对中国现代历史来说是重要的，所以他要记录，不管出版不出版。

中国给何伟带来不可磨灭的影响，可以说是是他生活中的转折点。在这里他找到了自己的职业定位、写作方向。在他眼中，中国是独一无二的。

何伟的《江城》书写的是他到达中国所待的第一座城市涪陵，1996至1998年，他在那里并不是记者，而是老师，这也是多年后他重回成都定居的一个情结。初入中国，那时的他不认识一个汉字，没有一个中国朋友。

在何伟眼中，涪陵是一座“处在变化边缘的城市”。上世纪90年代，那里还没通网络，也没有铁路，历来是四川省的贫困地区，公路非常糟糕。他有时是一个旁观者，有时又置身于当地的生活之中，这种亲疏结合的观察构成了他在四川停留两年的部分生活。他对中国最重要的看法、意见，是在涪陵这座小城建立的。

2001年，这本书在美国出版的时候，一条通往重庆的高速公路通车了，一条铁路也正在修建之中。何伟评价，这座城市正在飞速发展着，在过去的二十年，那样一种转型变化的感觉：接二连三，势不可挡，正是中国的本质特征。

涪陵虽地处边缘，同样能感受到社会的变迁。何伟以《江城》一书，描绘了变迁中的中国画像。除了少数外国同行，他每天面对的都是中国人，有要教的学生，有教职员，还有学生饭馆的老板，茶楼里出入的人。有大量的时间用来学习语言，他因此慢

慢能看懂墙上的标语。何伟和中国人一起过节，也尝试对付中国人饭桌上的酒场应酬，甚至包括个别有些麻烦的求婚者。在这座小城，他拥有了一个正式的中文名字：何伟。

何伟至今还与那段时期教过的100多个学生保持着联系，每年，他都会写一封长长的信给他们，20年前是手写然后复印的信纸，现在是一封封电子邮件。这些学生中九成来自农村，但现在他们都在城市生活。何伟坦言，去涪陵之前和他离开的时候，他看中国的角度已不一样。而涪陵所赋予的角度，到后来他继续书写中国，倒是没多大改变。

《寻路中国》是何伟认为自己写中国写得最纯熟的一本书。这本书缘起于他2001年到2008年在中国的自驾车旅行。这本书2011年一经出版，几乎横扫所有国内书媒的年度好书奖。

《寻路中国》中，何伟把观察中国的点分别放在了怀柔附近的三岔村和江南的丽水。一开始在三岔村，何伟的目标不是写东西，而是找房子，要去农村熟悉一下，没有想要写书，后来逐步改变观点，想写成文章发在《纽约客》上，才开始对当地村民正式采访。何伟去丽水，前后很多次，在那里一共待了一百多天。跟相同的人不断相遇，何伟认为这是写作的重要基础，因为逐渐相熟了，对方才习惯他这个老外的存在。在《寻路中国》丽水篇，书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位应聘职位开始还被排除在名单之外，最后竟然把一家三口都带进厂的小姑娘。这个小姑娘在应聘的时候，何伟就在旁边看着，之后还不断和她接触聊天。

通过乡村，何伟希望联接到中国的过去，而通过临近温州的丽水，何伟想探究中国未来的可能性。而这其中他始终聚焦的，是中国最普通的人。一个个普通人的际遇，共同构筑了这个时代的侧脸。

何伟说，喜欢写一些让他花很多时间与他们在一起的人。最好让这些人足够舒适，自己只是观察，而不是互动和提出问题。

通过何伟的文字，中国人透过一个外国人的眼睛看待自己的国家，获得别样新奇和震撼的体验。他文学化的纪实作品写作方式，对许多中文写作者产生了影响。

提起何伟，会让人迅速联想到“非虚构写作”一词。何伟作品的出版畅销，让中国媒体界和普通读者对“非虚构写作”开始有了概念。上海译文出版社社科编辑室主任张吉人从“外国人看中国”的维度落地，正式创立了“译文纪实”书系。这也是国内推出的第一套非虚构作品丛书。这些年，随着非虚构写作在国内的升温，不少出版社也都开始有计划地策划非虚构丛书类，但“译文纪实”以其开拓作用，依然一个佼佼的带头者。

如何理解“非虚构写作”？在何伟看来，非虚构就是所有内容都是真的，不能创作。非虚构写作的创造性在于作者怎么写、以什么样的风格。作者必须保证内容的真实性，同时也可借鉴虚构写作中的一些方法，这体现在写作手法、风格上。非虚构写作也和新闻报道不同。新闻报道要求时效性，非虚构写作则可以写得很长，并可以使用第一人称。

在写《寻路中国》时，何伟“想过那种隐居式的作家生活——从城市生活中悄悄地躲开，把手中的工作暂时放下来”。何伟家中没有iPad，也不让双胞胎女儿用手机，她们习惯了读书。多年来，何伟一直在寻找一处心之归属，试图远离尘嚣、回归内心。